



歌德说，“音乐是流动的建筑，建筑是凝固的音乐”。如果说建筑是音乐的话，那么筑起传统建筑的砖瓦就是那流动的音符。在江苏昆山市锦溪镇的中国古砖瓦博物馆，你会看见一片片、一块块古老、拙朴、厚重却不失美丽的破瓦，如同一串串音符谱就了一首经典名曲。这悠扬之音从历史深处飘来，吟唱着人类文明史的更替与演进。

走进锦溪镇位于清代民居“丁宅”内的中国古砖瓦博物馆，各类古砖瓦珍品琳琅满目。馆内珍藏最早的一块砖距今已有5000余年历史，为良渚文化遗物。它由黏土、稻糠和稻草糅合夯实，并以竹竿和芦苇作骨架，经大火焚烧而成，考古界称之为“红烧土”，也就是砖之“元祖”。

钟爱古砖瓦的陆秋生馆长在“红烧土”面前的讲解颇有激情，“华夏先民以超然的智慧、勤劳的双手、惊人的气魄，为开创人类的住宅文明，进行着一场泥与火的革命。盘泥成坯，开窑烧砖，筑室造屋，解‘茅茨土阶’之弊，建邑辟居，聚异姓之国。劈开混沌，走出洪荒，迎接东方地平线上即将升起的轩辕文明”。

仅400平方米的古砖瓦博物馆内珍藏着2300余件展品，跨越华夏5000余年的文明史。从汉代城砖、六朝板瓦、西晋纪年砖、唐宋青白釉瓦，到明清、太平天国、民国时期，乃至以五星为标志的青砖应有尽有，堪称一部卷帙浩繁的砖瓦发展史长卷，每一件藏品都是闪烁着中国古代劳动人民智慧之光的艺术结晶。

我国是世界砖瓦的发祥地。在陆秋生眼里，这些远古遗留下来的砖瓦承载的是历史，记录了人类文明前进的足音。

听，古砖瓦在诉说

□ 李佳霖

馆藏瑰宝“铜雀瓦”是建安十八年曹操在河北临漳建造的金凤台、冰井台、铜雀台之遗器，筒瓦背面镌有“建安五年三月造”。当年的铜雀台早已被历史的风尘所淹没，这片筒瓦却历经1700多年，仍妥善地保存于江南小镇一隅，让观者的思绪忽地飞到波澜壮阔的三国时代……

一组宋元明清特色瓦当吸引了我的视线。这些瓦当涉及龙凤、花卉、鱼虫、松梅竹菊、石榴莲蓬、富贵牡丹等诸多图案，或粗犷写意，或精细雕刻，品质之高，收藏之全，令人赞叹。宋元时期起，古砖瓦的装饰艺术从皇家宫廷延泽到了民间，为古砖瓦艺术的文化传承创造了便利。从江南民居到苏州园林，从“徽商”到“晋商”豪门府第，乃至北京四合大院，使用的古砖瓦雕饰无不构图新颖、刀功传神、工艺精湛。

陈列于博物馆正厅的一排“金砖”乃是铺设皇宫地墁的方砖。据馆中资料介绍，金砖乃钦工物料，质量要求十分苛刻，只有色泽纯青，敲之铮然有声，且完好无损才算合格。“金砖”规格大、易于变形，成品率极低，一般10块砖坯中仅出1到2块成品。“金砖”的产地在苏州，加上昂贵的运输费用，因此历史上真有“一两黄金一块砖”的天价。

参观完砖瓦展品后，再看“丁宅”的砖雕门楼。这座始建于清顺治年间的江南深宅大院，本为一“丁”姓商贾的豪宅。古朴沧桑的老宅，把古砖瓦文化映衬得更加厚重悠远。

锦溪这座美丽的水乡小镇曾有过72座窑，制砖烧窑历史悠久。大量古砖古瓦散落民间，引起了一些收藏爱好者的浓厚兴趣。1996年春，为进一步挖掘华夏古国的砖瓦瑰宝、弘扬“古砖瓦文化”，由昆山市人民政府、锦溪镇人民政府共同筹资并正式创建了“中国古砖瓦博物馆”。目前，锦溪以千年历史文化为底蕴，以古镇、古桥、古河为依托，精心打造“中国民间博物馆之乡”，已经拥有中国古砖瓦博物馆、中国历代钱币珍藏馆、华夏天文馆、华夏奇石馆、华东第一古董馆等15家博物馆。这一特色，正吸引众多中外游客来古镇锦溪一游。

《周末》执行主编 姜范

编辑 张济和 何东宪

敖蓉 李丹

邮箱 jjrbzmzk@163.com

◎近来，地标又成社会关注焦点。各种媒体多次评选“最丑建筑”，众多网友也热衷于晒一些造型奇特怪异的城市新地标，各种昵称、绰号不胫而走。

◎那些真心想打造地标的人们，不妨多给本土设计师一点信心、一些机会。

我们需要怎样的“新地标”？

□ 梁婧



在我们记忆深处，成功的地标性建筑总是能让人深度感知一个国家、一个地区、一座城市的文化内核、历史脉络、精神气质或经济实力。作为地标性建筑，有时承载起的意义超乎世人所想：为地域注入新活力，或是为世人传承文化与记忆……

□ 美与丑的变奏

某网站评选出了2012年第三届中国“十大丑陋建筑”，状似“金元宝”的河北元宝塔、耗资巨大的成都新行政中心、世界最高人工瀑布大楼苏州东方瀑布大楼等建筑入围。

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评选出的全球“最丑十大建筑”中，沈阳作为新地标的方圆大厦不幸位列其中。

仔细观察后发现，这些一开始就被当作地标来造的建筑造型独特，其中不乏名家设计，但却成了人们眼中的“最丑”。建筑丑在哪里？什么样的建筑才是人们心里的美丽地标呢？让我们看看那些获得普遍认可的中外城市地标：

当你漫步至埃及卢克索的古神庙遗址，游走于罗马的小广场，抑或是纽约的中央公园，你都会发现一座座方尖碑。

方尖碑传自古埃及，本是宗教的象征，随着时间流逝，各国都赋予了它新的意义：

阿根廷为了庆祝布宜诺斯艾利斯市建立400周年设计的方尖碑，成了这座城市的第一象征；

华盛顿纪念碑是一座大理石方尖碑，高169米，特区内任何建筑都不得超过它的高度……它们的意义更多地在于象征，或者纪念。

中国也有类似的地标性建筑——塔(楼)。古代的木质结构，决定了我国庭院文化的建筑特征，塔楼作为当时少有的高层建筑，成了古代传统意义上的地标。号称“天下第一楼”

的黄鹤楼，则是见证我国历史脉络，展现不同时代精神气质的标志性建筑。

20世纪二三十年代经济大萧条时期，建筑史上诞生了一个奇迹：建筑者仅用1年零45天便建成了102层、高达381米的帝国大厦，且质量优异，意外遭到一架美国陆军轰炸机撞击后竟然纹丝未动。不过，它的坚固却成为电影导演们的“戏”点：《金刚》中，那只巨大的猩猩爬上大厦顶端；在《西雅图夜未眠》中，它把浪漫发挥到了极致，成就了一场美好的爱情。

看来，真正有生命力的建筑，多是从一定的人文环境中生长出来的，因而才在历史长河中能够得以传承，继而成为地标。方尖碑如此，黄鹤楼如此，帝国大厦也如此。

反观我们的“最丑”建筑，“反人文”的内容比比皆是：河北的元宝塔是赤裸裸的“财富塔”，建筑造型似在宣示着金钱至上的观念；成都新行政中心则过于“奢侈”，据说单是建筑群的七分之一就卖了3.6亿元；苏州东方瀑布大楼是世界上最高的吉尼斯纪录，整个大楼由6个台阶式主瀑布和113米高的擎天玉柱顶楼组成，喷水高度超过138米，在推进节约型社会建设的今天，这种浪费水电的做法实在惹人反感。

对于建筑的评价，历来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，有地域差异，也有时空差异。但总的来说，不能脱离当地历史、脱离人文环境，否则最终只能成为一处碍眼的存在。

□ 迷失的城市风格

中国应该有专属于自己的、被世界所铭记的标志性建筑，这一点毋庸置疑。

鸟巢、水立方、国家大剧院的建成，无疑让外国人看到了中国的开放程度和我们的经济

实力。但与此同时，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步伐不断加快，不少城市也开始为争建地标建筑“风潮”推波助澜。

北边建了“大裤衩”，南边马上“小蛮腰”跟进；沈阳“铜钱大厦”被评为世界“最丑建筑”还没几天，抚顺耗资过亿元的“大铁环”又跳出来抢眼球；还有那北京望京“拉长”版的“中国馆”、杭州仿建的埃菲尔铁塔……这些造型“新颖”的建筑，设计也许出自哪个外国名家，身上也许有着某个名建筑的影子，单挑出来看也许都不错，但放在我们的城市，却不那么和谐。我们不禁要问，究竟哪里出了错？

“原因在于对自身‘式’的迷茫，以及对城市‘核’概念的缺失。”原建设部城市规划师、中国城市规划协会副理事长陈为邦说。

陈为邦举了个例子：在现代建筑进入日本的初期，日本建筑师们面对从天而降的外来文化一时束手无策，如何让现代建筑在日本生根成了最大命题。于是他们试探着在钢筋混凝土建筑上加上屋顶，称之为“帝冠样式”、“祥和折变”。这似乎有点自欺欺人的味道，但目的是好的，那就是要拥有“日本式”建筑。随着日本设计师们的不断尝试，他们重新审视日本传统文化的本质特征时发现，日本传统建筑空间的流动性、构造和表现的一致性、使用材料与自然融合等等，都与现代建筑不谋而合，这从根本上肯定了传统日本建筑的价值，也为现代日式建筑找到了出路。如今，他们的设计不再追求哗众取宠的形式，而是以全部的精力在实用的前提下阐述城市内涵，让居者爱其城。这代表了日本建筑关注日常、以人为本的传统，越来越受到人们的认同与推崇。

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任何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都有自身的特点与活力，这是建筑的“核”。只有坚持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，才能吸收外来文化的营养，丰富和发展本土文化，从

而产生适应时代并专属于自己的“式”。

现在，我们不少城市在丧失自身特色的同时，却到处兴建“地标式”本土建筑，也许只能用社会心理的浮躁来解释这种现象。人们不介意眼前一亮，但如果到处都亮，那就成了炫光，最终导致对形式麻木、对城市厌恶。

中国建筑曾与欧洲建筑、伊斯兰建筑并称为“世界三大建筑体系”。相对而言，中国建筑历史更加悠久，体系更加完整。在中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今天，热心于打造地标的人士，真应该好好研究一下所在城市的“核”，思考一下这个城市的“式”，从而使落地的建筑真正被老百姓喜欢，且经得起历史考验。

□ 亮出中国信心

中国近几年的新地标，从上海的浦东国际机场、东方艺术大剧院，到北京的央视大厦，再到广州体育馆、国际会展中心，以及广州电视观光塔、广州双子塔等，无一不是国外建筑设计大师的作品。本土设计师真的这么不给力吗？其实未必。

在加拿大多伦多，有两栋近60层的曲线建筑，被当地媒体和居民昵称为“梦露大厦”。“模糊性”自由度及无多余死角的概念，让“她”成为整个安大略省的最重要标志性建筑。这两栋让加拿大自豪的地标，均出自中国新锐设计师马岩松之手。

其实，中国设计师正在快速成长着，越来越多的中国设计师开始亮相世界建筑舞台。他们当中不乏有创意、有才华、有想法的人，欠缺的是经过历练后的成熟。

49岁的中国美术学院建筑艺术学院院长王澍，此前在业界并没有太大名气。2005年宁波博物馆招标时，曾设计首都

博物馆的法国AREP公司和曾参与国家博物馆设计的德国GIP公司都来参加竞标，专家评审团最终被王澍“新乡土主义”的想法打动。

王澍拿最具宁波地域特色的瓦片墙作为博物馆外墙，用的老砖瓦都是宁波旧城改造中拆下来的废弃物，这些砖瓦从汉代到清代中晚期都有，用在博物馆的墙面上，更能体现出这是个收藏历史记忆的地方。

其实，王澍瓦片墙的想法早已存在于他的头脑中和图纸上。然而，若非宁波博物馆给了他机会，这些美妙的想法不可能被世人所见识。王澍也正是在这一次次历练中成长起来，最终成为获得普利兹克奖的中国第一人。

记者走访了不少建筑设计师，有耄耋之年的老学者、老专家，有三四十岁的中坚力量，也有二十出头的入行新手，有句话在他们每个人那里都会听到——对中国设计师多些信心。

“全世界一半以上新建的工程都在中国，可以说，全球建筑师都来中国做事了。外国设计师有先进的技术、丰富的经验和细致的分工，也有好的设计理念，这是他们的优势。国内设计师聪明、勤奋，构思和理念也不差。同时，他们对中国文化和国情的理解则更透彻更到位。”中国工程院院士、建筑设计大师何镜堂充满信心。

建筑是一门综合艺术，本土建筑设计师的崛起，不可能仅仅靠个人努力就能够实现。在中国各地建设最活跃的年代里，如果只一味地为外国设计师提供“试验场”，而没能培养出具备国际水准的本土建筑设计师，那将是建筑行业的遗憾，乃至整个国家的悲哀。

那些真心想打造地标的人们，不妨多给本土设计师一点信心、一些机会。相信不久的将来，中国设计师会向世界交出一批类拔萃的“中国式”地标！